

中西方不同的翻译理论

(仅供东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参考)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Countries

(Reference only for Contrast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J.Yang

中国译论史概略

实践与理论总是相伴而行的。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翻译发展跨过同样的时代，经历同样的潮起潮落，历史同样古老。战国时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曾论道：“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用今人的现代语言来说，荀子在此提到了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不同民族虽然语言不同，但同为人类，具有同样的概念，因而可以通过翻译而互相交流。这恐是所能见到的古代最早的比较完整的译论文字了。如果深入挖掘的话，还会见到更早一些关于译论的零星片语，比如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在公元前约五百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另一处又提到孔子曾言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正是孔子对翻译的译名问题的论述。而“名从主人”也进入中国译学词典，流传下来。

然而，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虽然伴随着几次翻译实践活动的繁荣时期也出现过翻译理论的研究高潮，但译论家纷纭，译论纷纭，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根据历代译论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和中国的传统风格以及中国历史纪年，中国译论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古典译论时期和现代译论时期，以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为界，与翻译发展史基本一致。

1. 古典译论时期

这个时期又以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时值明末万历年间）为界。界之前为古代佛经译论阶段，界之后为古典译论发展阶段。界前界后，两个阶段别有洞天，却有一根主线贯穿整个译论发展的始终，这条主线便是关于翻译标准、翻译方法（文与质）以及译名问题的探讨。

一. 古代佛经译论阶段

根据现存文字史料，中国古代译经理论史的开宗第一篇为公元 224 年（三国吴大帝时）支谦所作《法句经序》，此时古代大规模的译经实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因原为月支人故姓支，与其师支亮及支亮之师支谶号称“三支”，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在其《法句经序》中最早提出翻译方法“文”与“质”之分野，并进行了论述，从此在中国翻译史正式开创了对峙的“文”“质”两派，即支谦倾向的译文至少应该“粗得大趣”的文（意）派和维祇难所倾向的译文“易晓”“勿失厥义”便可的质（直）派。

历史上最早主张意译的，还有后秦僧人鸠摩罗什（344-413），华名童寿。罗什第一个进一步提出译文应表现原文体韵（文体与语趣）的问题。他的一段著名论述见于《出三藏记集》：“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覲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后人常引“有似嚼饭与人”以证死译之乖。而罗什本人译经也的确做到了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宋僧赞宁：《宋高僧传》）

佛经译论的文、质之争自东晋高僧慧远（334-416）提出“厥中”见解，即“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始暂告停息。他批评文、质两派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提出“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即通晓双语，取两派之长辩证翻译，既“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

僧佑关于文、质的议论“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为后人乐于引用。

古代佛经译论史最早有意识、较全面地总结翻译理论、贡献最大的是道安和彦琮。

道安（314-385）东晋前秦高僧，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这里，道安总结了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佛经汉译时必然会出现的“失本”，即：1. 改变词序；2. 修饰文字；3. 删简词句；4. 删节复述；5. 削减赘言。何谓“本”？本，“真”也，即梁启超在“撮”道安“三不易”的“大意”时所提“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求之“本真”，也就是原文的本来思想、原本的真实面目。“本”又称“案本”，道安曾有言：“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该倒句，余尽实录。”（《婆沙序》）是说道安自己译经时尽量避免发生上述五种情况以力求不失本，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翻译方法上道安是“尊尚直译之论”（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道安总结的“三不易”是指：1. 古今习俗不同，古文雅朴而今文华藻，改古适今不易恰当；2. 以后世的浅俗理解古圣的微言大义不易贯通；3. 释迦牟尼大弟子出经尚难，后世凡人以仅度古更不易正确。

道安有一妙譬，将翻译的随意增删喻为“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从此，“葡萄酒被水”或“酒被水”与“窍成混沌终”“乳之投水”便成为“痛切”的翻译之戒，后人乐引不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开拓了中国译论史上系统总结翻译方法之先，而彦琮的《辩证论》则是中国译论史上第一部长篇翻译专著。《辩证论》所提出的“八备”之说，从另一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可以说是外篇或外部研究，而道安的关于翻译方法

的“五失本”“三不易”则可以说是内篇或内部研究)，“可谓深探本源”及“常谈耳”(梁启超语)。

彦琮(557-610)隋代名僧。其所著《辩证论》是他“久参传译”所得译经之经验总结，并具有翻译教科书的性质。“八备”是此书的最精彩、最杰出的部分：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前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衔，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八备”是指译(经)者所必备修养条件，“八者备矣，方是得人”。彦琮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的。一是人品，即其中一、二、五、六诸“备”：忠于佛法，乐于助人，不嫌费时；遵守戒律，品行端正，不招非议；心胸宽和，谦虚待人，不可武断；专心研究，淡泊名利，不出风头。二是关于学识的，即三、四、七、八诸“备”：博览诸典，通义达旨，不存疑义；涉猎文史，精于词句，不译笔硬；精通梵文，掌握译法，不失原义；兼通训诂，熟习文字，不悖原文风采。

彦琮在《辩证论》中还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涉及到翻译标准问题。彦琮是主张“信”为第一位的，推崇直译。

唐代高僧玄奘译经成就斐然，但遗憾的是传世译论却极少，恐多佚传。仅见的玄奘“五不翻”译论见于宋僧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首“周敦义绍兴丁丑年序文”：“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偏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

玄奘提出神秘语、多义词、没有对应的名次、约定俗成的音译、无法保持原词原义与色彩的词语皆需“不翻”之翻译的音译，总结出几种本不可译的情况，使直译与意译的方法得意延伸。以音译作为着可译情况的一种变通手段，玄奘的总结是很恰当的。

中国译论史上的古代佛经译论阶段，尤其自六朝至隋唐时期，虽然译论的发展远逊于译经活动的繁盛，且形式上多限于序跋片语，但所论既广、论及又深，涉及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论及翻译难度、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原则、译名问题、音译问题、翻译批评等。这是为中国译论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奠定基础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译论雄据世界译论之林前列的一个时期，是中国译界值得骄傲的一个时期。

二. 古典译论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古代末期(鸦片战争之前)和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两个时期。这一阶段的议论与前一阶段相比，最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古典译论终于结束了译经理论的时代，尽管译经理论的探讨仍在零星继续；而救亡与启蒙的爱国主义思潮也取代了宗教虔诚灌注于译论的发展之中。例如徐光启(1562-1633)就曾发表过“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关于翻译目的的著名议论。

这一时期关于翻译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对于利国的重要性及翻译的功能内容方面。直到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魏象乾著有《番清说》，弥补了这一段

的空白。只是这一珍贵的文献由于是朝廷内“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用书，用以指导“御用”翻译，没有外传，因此一直鲜为人知，佚失于中国古典译论史外竟达两个世纪。

魏向乾所著《番清说》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汉番（翻）清（满文）的经验，涉及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等重大问题。关于翻译标准，书曰：“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以避免“出入失正之弊”。这五“其”五“不”精辟地表述了“正”译的标准，猎及意义与风格。当然偶有增减颠倒的情况也应允许的，“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书中关于《孟子》满译文的评论：“气势畅沛，清文之脉络可宗；字句安妥，清文之措词可宗；体认精译，清文之理致可宗；或则含意，或则传神，不支不，清文之精练可宗；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清文之真切可宗。”又进一步论及脉络、措词、理致、精练、真切诸方面，并提到气势、含意、传神、实字、虚文等，言之甚为精彩，确实难能可贵。

近代译论的发展有较大起色，新论论家频出，尤以维新派成绩卓著。

马建忠（1845-1900）在其名篇《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对翻译标准的新解释，即“善译”：“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文中有两点至为深刻：1. 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的了解和掌握已经深入之语言的文化各个层面；2. 提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相同感受问题。

梁启超的译理思想是其《变法通议》第七章《论译书》，文中提出的译书三义：“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对选择翻译内容、统一译名、培养翻译人才都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

林纾较早对文学翻译进行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谈到了译者的情感问题，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投入感情，与作品及原作者心灵交通，“或喜或愕，一时颜色无定，似书中之人，即吾亲切之戚畹。遭难为悲，得志为喜，则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我牵丝矣。”林氏还最早论及译诗：“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很有见地的。

关于诗论则要提到胡怀琛（1886-1938）。大量译诗始自苏曼殊、马君武，而开创诗歌翻译理论探讨之先的，却是胡怀琛。胡氏1914年出版的《海天诗话》是中国最早的诗论。胡氏提出译诗必有“失”：“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他还首次论及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剪裁锻炼，未为不可译。若据文直译，则笑柄乃见异。”对于译诗水平高下问题，胡氏这样论道：“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昔某君尝为予言：学一国文字，如得一金矿。其言谐而确。然余谓：既得金矿，尤当知锻炼，不然金自为金，何益于我哉！”

张元济（1867-1959）也曾论过译诗的用韵、直译问题。他说：“前者用韵，后者直译，文从字顺，各有所长。”认为二者皆可，应灵活运用。他还认为“彼邦之诗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因此主张译诗也应通俗，“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字，别译一编”，以便“老嫗都解”，也是很有见地的。

高凤谦（1870-1936）也曾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若译书之人，必兼通中西文而后可。其有专精西文者，可以文士辅之。传曰：‘言是无文，行而不远。’必使所译

之书，质而不流于俗，博而不伤于诞，文义可观，又无失原书之意。”其中对于翻译标准的表述不失为难得的精当之论。

古典译论发展时期的最大建树莫过于严复的“信、达、雅”了。这一声名传千古的三字翻译标准，是严复在《天演论》卷首《译例言》第一段中提出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关于三字的立论依据，严氏在第三段中解释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于此也可看出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密切关系。

对于三字的理解及其关系，严复曾作如是解释：“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世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钧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可见，“信、达、雅”三字的排列顺序严复是明白地附以极为重要的主次意义的。

三字理论与西方译论有似处。一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相似。二者都论及翻译标准的三个方面，但：1. 表达内容有不同；2. 表达顺序有不同，尤其严氏更加强调三个字的顺序；3. 表达方式有不同：三原则繁述，三字简说，繁述者详备而简说者深刻但可发挥。二与赫伯特·罗森斯坦（Herbert Rothenstein）的“Triness”即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gracefulness* 相近。二者几乎同时成名，同被誉为东西方各自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这是历史的异曲同工，也说明二者的客观性。

“信、达、雅”集中国翻译标准理论之大成，成为历史上公认的翻译标准的经典表达，且表达精练之极未有能超越取代者。可以说，“信、达、雅”是中国古典译论史上的一座丰碑。

2. 现代译论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正值翻译发展史的繁荣时期，翻译开始使用白话文。翻译的内容也扩展到从科技到诗歌的几乎各个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译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发，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非昔时所能肩比。

这个时期以1949年为界。1949年之前为新文化开发阶段，之后为当代开发阶段。

一. 新文化开发阶段

这一阶段历时短暂（只有三十余年），而成就不菲，译论家济济，且多为翻译名家。译论家多有社团或流派以及政见的背景。因此译论的探讨多以论争进行，论争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远超乎近代时期，成为中国译论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论争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翻译的“内部研究”上，更论及翻译的“外部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在各流派、各社团、各名家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译学理论的雏形。

这个阶段的译论的发展是以胡适（1891-1962）、刘半农（1891-1934）、罗家伦（1897-1969）、傅斯年（1896-1950）等人对守旧的封建文人尤其是点名对林纾及严复所进行的批评为开端，拉开了一场译论大探讨、大论争的序幕。对林、严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翻译的选材内容、翻译方法、译名各方面。刘半农关于译诗“直译”的论述颇有价值。他说：“到了文艺作品里，就发生一个重要问题：情感。情感之于文艺，其位置不下于（有时竟超过）意义，我们万不能忽视。但情感上种种不同的变化，是人类所共有的；而语言的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至为重要却又是不可译的声调问题，他提出“神情”补偿之：“要是他能得到这神情，他虽然不把原来的声调搬

过来，也一定能在译本中得到一个相当的声调。我想，我们在译事上，于意义之外，恐怕也只能做到求声调于神情之中的一步。”

社团中译论建树最大的为文学研究会。该会主要代表人物郑振铎、茅盾等对译论都有杰出的贡献。

郑振铎（1898-1958）继胡怀琛后更为明确地强调了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指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而文学的桂冠诗歌的翻译“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这个译论在当时影响很大。

茅盾（1806-1981）即沈雁冰，对于“内部研究”方面，茅盾有精彩之论，尤其是“神韵”之说：“介绍时一定不能只顾着这作品内所含的思想而把艺术的要素不顾，这是当然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灰色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译成红色，神秘而带颓废气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译成光明而矫健的文学……如果能不失这些特别的艺术色，便转译亦是可贵；如果失了，便从原文直接译出也没什么可贵，不朽的译本一定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也惟是这种样的译本有文学的价值。”（《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又提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的问题。“与其失‘神韵’而留‘貌形’，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文学的功用在于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再就实际上观察，也是‘形貌’容易相仿，而‘神韵’难得不失。”

关于神韵，郭沫若（1892-1978）称为“风韵”：“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创造社的郁达夫对译论也有很大建树，尤其是对“信、达、雅”的深刻论述。他在信、达、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过这三字是翻译的外的条件，我以为没有翻译以先，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所以我对于上述的信达雅三字之外，更想举出‘学’、‘思’、‘得’的三个字来，作为翻译者的内的条件。”所谓“学”者，“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所谓“思”者，是指“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到尾，设身处地的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至于所谓“得”者，“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

创造社另一位主要人物成仿吾（1897-1984）在《论译诗》中提出：“译诗虽也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一个整个的诗，所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的重要观点，又提出“译诗应当忠于原作”：“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认为第一条“是诗”要看译者的“天分”即感受力；第二条“情绪”要看译者的“感受力”与“表现力”；第三条“内容”要看译者的“悟性”与“表现力”；第四条“诗形”要看译者的“手腕”，仍

指表现力。他还将译诗分成两种，即：一、表现的翻译法 Expressive method；二、构成的翻译法 Compositive method。表现的翻译法是指“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构成的翻译法是指“保存原诗的内容的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成氏进一步解释道：

“表现的翻译法是要从一个混一的情绪放射出，所以它的作用是分析的，远心的；构成的翻译法恰恰相反，是要从散乱的材料结合起来成一个混一的情绪，所以它的作用是综合的，求心的。

表现的翻译法既是由译者放射出来，结果难免没有与原作的内容不同之处；譬如，原作字句的先后详约，每被颠倒或更改。这是它不如别的一法之处。然而构成的翻译法，虽在内容上可以无限地逼近原诗，而情绪每有不能用这种自绳自缚的方法表现出来的。”

提出“以诗译诗”的，还有闻一多（1899-1946）：“在译诗时，这译成的还要是‘诗’的文字，不是仅仅用平平淡淡的字句一五一十地将原意数清了就算够了。”闻氏还提出好诗“是禁不起翻译的”，就象一朵鲜花，“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既要译诗，只好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不可能来”。

第一个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翻译的是曾虚白（1894- ），他是用摄影来比翻译的。“翻译家镜头的目标却不能求之自我了；他的摄景是人家已做成的片子，要他照模照样再翻一张出来。负着充分摹仿人家个性的使命，却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的个性钻出来胡闹。所以创作的需要是独立性，翻译的需要是摹仿性。”曾氏还对“神韵”进行过论述：“其实，所谓‘神韵’者，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换句话说，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感应。”这种主观感应说将翻译标准理论融进美学、心理学的原理，很具有现代译论的气息。

陈西滢（1896-1970）则用雕刻师的塑象、画师的画像来比翻译，又进一步用临摹古画来比，从而进一步提出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形似的翻译效果往往相反，使轻灵变成笨滞，活泼变成古板，滑稽变成无意识，伟大变成无意义。意似的翻译则要轻灵的归还它的轻灵，活泼的归还它的活泼，滑稽的归还它的滑稽，伟大的归还它的伟大。

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并第一个明确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将现代语言学 and 心理学作为译理的“学理剖析”的立论根基。他还论述了翻译的三重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并承认“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他又将这三条标准转换为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这种论述很有创见，后人往往借此发挥。林氏在谈到直译与意译时另外提出“字译”与“句译”，并指出：“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语意，这是字译与句译的区别。”实际上，句译这一提法已经触及到翻译单位的问题。

陈康论述翻译方法时说过“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还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陈康的两句对言：“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和“文胜其质，行远愈耻”见解独特，很为后人所称道。

鲁迅关于译论的文章主要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几条“顺”的翻译》（1931），《风马牛》（1931），《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932），《为翻译辩护》（1933），《关于翻译》（上）（下）（1933），《论重译》（1934），《再论重译》（1934），《“题未定”草》（1935），《非有复译不可》（1935）等。

鲁迅关于译论的最大贡献是关于“直译”问题的论述，在译界论坛高树一帜，留下不少的发前人所未发的佳论。坚决主张“直译”。

鲁迅最为精彩的“丰姿”说发表在《“题未定”草.二》中：“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想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这段论述不单深入讨论了“直译”的问题，提出“移情”“益智”及“洋气”“异国情调”等重要观点，“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又是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精妙论述，涉及翻译美学等问题，成为传世之论。

二. 当代开发阶段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国的译论基本上处于“闭门造车”的状态，关上了与国外译论发展交流的大门。这个时期来自国外的理论，主要是一些“有指导意义”的前苏联的数量有限的论著。

傅雷是鼎鼎的大翻译家，也是影响极大的著名译论家。傅雷是极力推崇“神似”一说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翻译观：“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神似”说自茅盾、陈西滢首创以来，经傅雷大加推崇并用绘画作比，竟至一时名声大噪，流传甚远，终成我国译论界的一大派系。

我国当代名震中外的大学者钱钟书也对文学翻译作过精湛论述。在《管锥编》中，他对翻译标准有过精彩的辩证的论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他认为信、达、雅三字既非孤立，也非平等，其理辩证，其言深刻。钱氏关于翻译的最高境界一说，更是脍炙人口，与“神似”说有同工异曲之妙，成为译论界又一大派系。关于这一最高境界的缘起，他作如是解说：“汉代文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𠮟，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𠮟’，读若‘𠮟’。”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𠮟”、“讹”、“化”和“𠮟”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钱氏关于著名的“化境”的精彩论述是这样的：“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氏还有一段关于两种翻译方法的描述，发人深思：“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个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

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看来，钱氏的重点是倾向于“译成的这一国语文”的。其实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出发点对到达点必然会产生影响。在这一问题上，鲁迅的重点则是倾向于“引导我国读者走向外国作家那里去”的。

不过，就“神似”“化境”翻译观的本质来说，仍属于文学或美学的概念范畴。有人将此作为翻译标准，总结为“神似”标准、“化境”标准，就有文不对题之嫌了。另外，如果将“神似”“化境”与直译对立起来，就更容易走向荒谬。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译界曾有一个阶段对“重神似不重形似”进行了偏激的解释，变成流行一时的“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口号，形成所谓“新林派”的一种翻译倾向，对风行一时的赶译、抢译、滥译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就“神似”“化境”翻译观的本质来说，仍属于文学或美学的概念范畴。

八十年代后期以后，对翻译标准的讨论还在标准的多元化、模糊测度和定量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新探索。

这个时期的译论首先试图在我国传统的几个翻译基本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寻求打破长期徘徊的局面，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首当其冲的传统基本翻译问题便是翻译标准。翻译标准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主体，是开展翻译批评的依据，也是其它译论问题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现代译论发展时期理所当然地先将火力集中于斯处。

“信、达、雅”三字更是首当其冲之其冲。尤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翻译标准讨论的主流便是对“信、达、雅”地位的重新认识、重新解释和重新定位。“信、达、雅”究竟应不应该继续稳居翻译标准的最高宝座上？是否有新的更好的表达可以取而代之？讨论的结果，除少数观点认为这三个字阻碍了中国译论的发展，即使修订或重新解释也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原地踏步，已经到了非摒弃不可的时候了。但大多数见解逐渐趋于一致：在尚未产生更好的表达之前，可以赋予“信、达、雅”以新的理解、解释和含义。更准确地讲，是用新时代的新含义来正确理解“信、达、雅”，继续继承和沿用之；因为，人们提出过不少新的表达方法，未有能超越“信、达、雅”者。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字词及表达赋以新义是应该的，而且自古如此。

对“信、达、雅”的理解主要集中于：1.对三个字的具体理解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上。“雅”被理解为“文雅”、“文采”、“风格的雅”、“文体的雅”、“切”、“贴”等等。对“信”的理解则普遍认为三个字的涵义是不同的，“信”中应该包含有“达”和“雅”的成分，不应将“信”的涵义缩小；2.三个字的相互关系上。人们重点对“信、达、雅”三字的关系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三个字不是孤立的，不应该以并列来看待。“信”指的是对原文意思的忠，“达”指语言通顺问题，“雅”指文体，即语言风格问题。“信”是统帅，是第一位的，因此“达”“雅”也不应该离开原文的“达”“雅”而一味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也有观点认为“信”与“达”为统帅，是“翻译的必须条件”，而“雅”为翻译的“充分条件”。还有的观点认为干脆只用一个“信”字，因为“信”已包括了一切。

在多元化方面，认为存在着若干共时的标准，从而将翻译标准分解为绝对标准（即原作本身）、最高标准（即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即分类标准），而其层次关系为：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具体标准。然而如果将绝对标准理解为虚设，则其实际用途极其有限，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渴求绝对标准的欲望”，从而否定了“忠实”的提法，成为“如摘镜中之花”，还需要进一步的慎重研讨才能得出结论，不然容易引起混乱。这需要解决“忠实”究竟是“抽象”的还是“客观”的问题。翻译的多元化的具体划分不止于这一种，也有从其它角度对翻译标准进行具体分解，如根据话语层便可提出七条标准，即：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

场合性，等等。

模糊测度主要是从思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认识、审美和语义的模糊性出发进行考虑的，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了西方传统的“等值”观与中国传统的“相似”观的比较，探讨了求等的翻译思维与求似的翻译思维等问题。

定量分析是相对传统的对译文评价的“定性分析”也称“半定量分析”而言，将模糊数学的理论如模糊集合理论与方法及公式引入翻译标准的评定中，借助于模糊数学中的模糊聚类分析法对译文各单位的隶属度进行判断，同时结合专家评判法对隶属度作最后确定，从而作出译文质量的评定参考指数。翻译标准在定量分析方面的探讨尤其对自动翻译与机器阅卷具有很大实用价值。然而翻译毕竟不是数学，有些问题如隶属度如何划分、权重集如何建立、评价单位如何确定等都不是公式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如何处理好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这将是定量分析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另外，也有根据语言的静态等级和动态层次，通过若干平面求得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关系，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也类似于数学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继续朝着文学翻译的风格的方向深入探讨。首先对风格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述，一致认识到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皆可译。对风格的可译性还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美学和应用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风格意义的可知性、风格的认识论依据、风格的翻译转换手段、风格的翻译标准、风格翻译的原则、风格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以及诗歌的风格翻译、散文的风格翻译等等问题也同时进行了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分析的有意义的探讨，尤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风格翻译的探讨热。

翻译方法是另一个深入探讨的翻译基本问题。

首先是讨论了一千多年的直译与意译问题仍在继续讨论。时至现代，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在孰优孰劣上。经过新文化时期以来的反复讨论，在这一点上各派基本达成共识：直译与意译不应是互相排斥、不相容的关系。探讨深入到两者与翻译标准所具有的关系和适用的场合。关于前者，主流观点认为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应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即必须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把“信”放在第一位；否则，既非直译也非意译。仅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决非直译而是死译；仅追求译文的语言形式则决非意译而是乱译。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在把“信”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直译将原文的语言形式放在第二位，译文的“达”要服从于原文的“达”；意译则将译文的“达”放在第二位，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意译多用于文学翻译。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继续朝着文学翻译的风格的方向深入探讨。首先对风格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述，一致认识到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皆可译。对风格的可译性还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美学和应用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风格意义的可知性、风格的认识论依据、风格的翻译转换手段、风格的翻译标准、风格翻译的原则、风格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以及诗歌的风格翻译、散文的风格翻译等等问题也同时进行了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分析的有意义的探讨，尤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风格翻译的探讨热。

关于风格翻译的讨论必不可免地又引发了翻译美学的构思问题。现代美学基本理论的构思提出了四个核心内容（即翻译美学的范畴）：审美客体（原文）的表象要素和非表象要素；审美主体（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以及审美标准的相对性、时代性、社会性和依附性。翻译美学的讨论还涉及到神韵的概念，分别从风雅、韵律、情操、灵感进行论述，阐述了翻译的神韵观的内容。翻译美学的讨论和进展对于翻译的审美标准的研究、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大

意义。

翻译单位也受到重视。引进了国外的语义确定法、话语切分法和逻辑分解法，对翻译单位的可操作性、对分析单位（及理解单位）和转换单位（及表达单位）的区分，探讨由静态分析进入动态分析的阶段。

对翻译原理的探讨也取得一定成果。一方面，开始重视翻译原理的系统性研究对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对翻译理论具有的职能、翻译的本质、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翻译的层次、语义的对应的可能性和非对应的必然性及转换模式、翻译中信息的传递模式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等等都有涉及和进展。另一方面，翻译原理探讨注意了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具有比较强烈的跨学科性质。

关于横向联系。翻译具有比较和跨学科的性质，尤其与哲学、思维科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信息科学等关系密切，处于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综合背景之中。这种跨学科研究也被称为“翻译学外部系统”，即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文化系统。

思维与逻辑引入译学研究，使译学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翻译过程中的活动规律、原作者与译者的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受到重视。

这个时期语言学的飞速进展带动了整个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符号学的发展，更促进了语言对比翻译的对应规律的研究，使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步形成“符号学翻译模式”概念，使翻译理论开始跨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为译学提供了研究的新角度、新视野、新方位。

社会文化使译学研究跨出纯语言研究而进入一个更新更广阔的研究天地。八十年代后对于对比文化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探讨逐渐形成热潮而且逐渐深入。

翻译美学的构思也与美学的研究成果紧密相关，美学原理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受到重视，对于翻译中的美学原则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口译研究也有明显发展，研究主要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技巧研究方面。基本理论涉及口译的定义、特点、语言风格、标准、临场心理、效果评价等当面。基本技巧包括综合性的口译技巧、政治会谈性的口译技巧、科技性的口译技巧、商务性的口译技巧、导游的口译技巧、同声传译的口译技巧及口译的技艺技巧等方面。

除此之外，在自动翻译、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深入。

西方译论史概要

漫步于西方译论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以使人领略到西方学者们对翻译理论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不断求新的开创进取的精神和实践的轨道。

1. 开创与译经理论的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以公元前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为源头，以十八世纪末的泰特勒殿后，绵延近十九个世纪。

远在古代译论早期，大批杰出的译论家便不断涌现，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的著名学者，如金蒂连（Quintilian）、西塞罗（Cicero）、霍勒斯（Horace）、加塔提斯（Catullus）、小普利尼（Pliny）等都对翻译理论进行过探讨，其中西塞罗与霍勒斯最具代表性。曾做过执政官的著名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与散文家马尔库斯·图留斯·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 的翻译两分法, 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译文与原文关系的忠或不忠、翻译基本方法的直译与意译的重大翻译理论问题。他说: “我不是作为解释者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 不是词当句对, 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 (《论演说术》, 46BC) 他将翻译分为“解释者”的翻译和“演说家”的翻译两种类别而自称属于后者, 而且是针对词对词的死译而言的。其稍后的昆塔斯·霍雷修斯·弗拉库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BC), 通称霍勒斯 (一译为贺拉斯) (Horace) 是奥古斯都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批评家, 他更加明确地反对词对词死译的做法, 主张“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直译”而应该采用“意义对意义” (sense for sense) 的活译。西塞罗与霍勒斯处于古典哲学的时代, 因此他们的关于“自然”与“和谐”的翻译美学观的译论显然受到哲学的影响, 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性论的影响, 认为翻译的模仿顺于理念的本质而顺乎自然、归于和谐、实现美的统一; 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理念的原则不应僵化, “及致损害原文的风貌”。后来这种主张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如昆提利安便提出译者需与原作者“竞争”、翻译便是创作的提法。

西方古代译论在公元四至五世纪达到其鼎盛期, 代表人物为杰罗姆和奥古斯丁。杰罗姆 (St. Jerome, 347-420), 著名宗教作家, 他提出的“文学用意译, 《圣经》则用直译”的主张将译论探讨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见解十分精辟, 针对自西塞罗之后进半个世纪的重新泛起的“陈腐”译风, 大胆呼吁“译者都应该作本国语言的主宰”, 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他本人正是拉丁文《通用本圣经》的译者。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对于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古代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早在奥古斯丁之前约二百年的克劳迪亚斯·盖伦 (Claudius Galen, 129-199 A.D) 便已提到 Semiotics 即哲学上的“符号学”一词。可见作为西方翻译理论基础的符号学几乎与古代译论同样源远流长。奥古斯丁作为与杰罗姆同时代的著名宗教作家, 也对《圣经》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凭上帝的启示”、“凭灵感”。杰罗姆与奥古斯丁对于翻译理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杰罗姆与奥古斯丁之后, 整个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除偶有与《圣经》的翻译有关的论述以外, 西方译论也进入一个漫漫的无甚建树、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译论基本上以宁要“内容精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为主, 只是到了公元九世纪, 英国西撒克逊国王兼学者的阿尔弗雷德 (Alfred “the Great”, 849-899) 又提出“有时逐字译, 有时意译, 力求译文清楚易懂”的灵活翻译的主张。其后意大利“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恩格斯语) 但丁·阿里盖利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又提出“文学不可译”论的新观点, 体现了西方译论的开创进取精神, 标志着西方译论即将步入文艺复兴的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译论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但倾向于向古代文化寻求新思想。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论家有 Netherlands 著名语言学家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主张《圣经》翻译者的语言知识, 而不应屈从于神学权威; Deutschland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用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他所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当时影响颇大, 可归纳为七条: 1. 改变词序; 2. 添加情态动词; 3. 引入起连接作用的词; 4. 删去译文中没有对应词的原词; 5. 必要时译文用短语表达原文单词; 6. 将比喻译成非比喻, 将非比喻译成比喻; 7. 分清神学语体与其他语体。

法国语言学家、印刷商艾蒂安·多莱 (Etienne Dolet, 1509-1546) 提出“翻译五原则”, 即译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采用通俗的口语形式和保持原文风格及韵味。多莱提出的这五个翻译原则是很有见地的, 他被认为是

西方译论史上第一个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在十七世纪之后的近代，英国作家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 1618-1667）是在当时非宗教翻译家中出现的翻译自由化倾向的主要代表，他主张多译，以意译之，反对逐词翻译。英国剧作家、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翻译家约翰·德赖登（一译为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则首次提出“直译”、“意译”、“拟作”的三分法及翻译是艺术的重要观点。三分法即翻译的三种类型：1. 词语转移法，即词对词地直译；2. 意译法，即意思对意思，不可对原意发挥；3. 伪译法即拟作，译者可以改动原文的词语和意思。实际上，德赖登继考利之后将翻译的自由化推向高峰，不讲“忠实”的自由翻译风盛行。这也是翻译史上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必然现象。德赖登很早便提出翻译是艺术的观点，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而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是今天的译论家仍在讨论的话题。法国的巴托（1713-1780）则又冷静地提出过“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译文“不增不减不改”的精确翻译论。

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译论家为坎贝尔和泰特勒。乔治·坎贝尔·阿伯丁（George Campbell of Aberdeen, 1719-1796）1789年发表了《圣经》翻译的三原则：1. 正确表现原文意思；2. 尽可能传达原作者的精神和态度；3. 保持原文的表现力，自然而易懂。第二年，英国苏格兰文艺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41）在其《翻译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进一步的针对一切作品的翻译三原则，即：1. 译文应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义；2. 译文的写作风格和韵味应与原文一致；3. 译文应与原文同样流畅。从思想内容、文体风格、语言三方面对翻译原则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泰特勒是西方译论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译论家，是西方译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泰特勒还最早触及到翻译的等效概念，明确提到相等的感受问题。

2. 现代译论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始于十八世纪末，延续至今。又以二十世纪中期为界，以前为承前启后的开发的初期阶段，以后为开发的现代阶段。

一. 西方译论开发的初期阶段

中世纪之后，全欧兴起启蒙思想运动。这个时代出现的以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神秘主义为宗旨的诠释主义学派（hermeneutics），则成为当代翻译理论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该学派的代表施莱尔玛克赫（F. E. D.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深入探讨意义，在其释义理论中提出确定检验语义必须以对文本的共时的共识为依据；词语的意义必须以语境为参照。施氏的释义理论强调了译者与原作者的共识，强调透过文本探测原作者的思维轨迹。施莱尔玛克赫还具体地提出口译与笔译、文学性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别。除施莱尔玛克赫之外，这一时期还有洪堡特（1767-1835）、英国的安诺德（1822-1888）等等发表过一些译论，主要也都集中于文学翻译方面，如洪堡特关于可译性问题的论述和安诺德关于“翻译荷马必须正确了解荷马特征”的观点等，而以法国的瓦勒瑞（P. Valery）1946年发表《圣·杰罗姆的祈求》标志着这个初期阶段的终结。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评论比较泛泛，在具体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上并未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二. 西方译论开发的现代阶段

在译论开发的现代阶段，西方译论界不拘于诠释一派之学说，而是在其基础上突破作为西方译论背景的宗教与哲学的领域。这个时期翻译理论的探讨的最大特点是积极吸收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如对比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理论等，从语言的表层到语言的深层，从语言的结构到语言的意义，从语言的本质到语言的功能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利用哲学、自然科学、

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和发展，形成诠释学派、语言学派及由语言学派所派生的交际功能学派、社会符号学派以及传统的文学派等不同角度，或偏重于意义，或偏重于结构，或偏重于双语现象，或偏重于语言的功能，或偏重于句型变换等，对翻译的原则、翻译的性质、翻译的类别、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技巧等进行研究。

文学派也称语文学派或文艺学派，历史悠久。西方译论远在古罗马的著名喜剧作家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190?-159），通称泰伦斯，便已开始了语文学方向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方法、翻译目的和效果，以及翻译的风格、诗的翻译进行了文学方面的探索研究。当代语文学派与功能文体学与社会符号学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式研究，注重研究各种文学形式的翻译、“对策规范”及接受者因素等，如霍姆斯（J. Holmes）、克鲁申纳尔（A. Cluysenaar）及列费维尔（A. Lefevere）等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列费维尔还将美国著名诗人及翻译家庞德（E. Pound, 1885-1972）的译诗经验总结为影响较广的译诗的“七项对策”，即：1. 音素翻译；2. 逐字对译；3. 音步翻译；4. 散文化翻译；5. 音韵翻译；6. 自由诗体翻译，即有韵诗译成无韵诗；7. 意译。列维则提出“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幻觉”、“翻译重在再创作”的文学气息浓烈的翻译理论。

与语文学派相对的另一译论研究方向是语言学派，其源头可追溯至古罗马的奥古斯丁。二十世纪西方译论进入开发的现代阶段以后，语言学派成为现代译论研究的主流，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研究现代西方译论便不能不着力从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角度去追寻翻译理论发展的踪迹，因为西方译论家们基本上共同认为，翻译更多地应该属于语言的学的范畴，尤其与语义学及语用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语言学派从北美到欧洲译论家人才层出，包括维奈（J. P. Vinay）、达贝尔内（J. L. Darbelnet）等。卡特福德（J. Catford）以 M. A. K. Halliday 关于语言结构分为“级”或“层”的形式结构原理为依据，集中探讨了翻译的“等值”问题，即 SL (Source Language) 与 TL (Target Language) 的某一级对应形式结构单位形成等值关系，如在本级不能形成等值关系则在上一级形成，比如从词素级升为句子级。卡特福德及弗斯（1810—1860）的“言语环境对等”理论强调了语言结构的形式，对语义结构的意义及功能却重视不够。这也是语言学派容易产生的一种普遍倾向。法国语言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注意到翻译的意义问题，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探讨了译文与原文的概念接近问题，提出各民族和语言集团对事物的切割不同，因此应予考虑每个切割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实际上穆南的主张即是“从意义出发并在语义领域之内”进行翻译。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 Jakobson, 1896-1982）提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翻译三类别，并精辟陈述过翻译的对等问题。他说：“差异之中的对等，这是语言的根本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课题。”说明对等是相对的。

纽马克是当代译论大家。他对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翻译等效原则提出异议，说明一是有些情况下等效是不可能的，二是译文忠于原作者就不一定能够忠于读者。为此，他将译文分为两类，即忠于读者的“通达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忠于作者的“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当代西方译论成就最大、威望最高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奈达是集语言学各派翻译理论之大成者。从结构主义的成分分析方法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句型转换机制，从以话语语言学和信息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交际功能翻译模式到以现代语言符号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他不断开创进取，阐述了双语对比的翻译理论、动态对等翻译、等效翻译、翻译的语言与文化等重要翻译理论。奈达著名的“动态对等”理论是在1964年发表的《翻译科

学初探》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该书也被西方翻译界公认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代表作。

“动态对等”理论是社会符号学所提供的观察翻译理论新视角的直接产物。最早全面提出符号学概念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 1839-1914),由哲学家卡尔纳普(R. Carnap, 1819-1970)和莫里斯(C. W. Marris, 1901-)进一步发展,并由莫里斯划分出符号的三个方面,即语义(mantic)、语用(pragmatic)和符号关系(syntactic),所对应的符号学意义则称为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奈达充分认识到符号学对于翻译理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符号学的翻译模式“具有某些优越性”。

“动态对等”理论的提出是翻译理论的重大进展。由于“动态对等”阐述了翻译的效果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直译强调形式对等而忽视效果,自由译强调译文效果而忽视对等的矛盾,从而使贯穿整个西方翻译史的直译与自由译之争基本得以平息。后来,奈达又将“动态对等”的表达作了一定的改动,用“功能”代替“动态”。以往的翻译理论多强调原作到译文的转换,奈达则特别强调读者,这样将原作者的意图和期望所产生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及译文读者的反应也纳入翻译的视野。奈达的论述也涉及到对意义的理论描写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翻译的内容与风格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不足。

参 考 文 献

- 贝尔曼. 1995. 《翻译批评论: 约翰·唐》[M]. 巴黎: 伽利玛出版社。
- 蔡毅、段京华. 2000. 《苏联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陈福康. 1992.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程工. 1999. 《语言共性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郭建中. 2000.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黄国文(主编). 2002. 《语篇·语言功能·语言教学》[C].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勒代雷. 1994.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 刘和平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李思孝. 2003. 《简明西方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文革. 2004.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廖七一. 200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刘宓庆. 2001.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刘重德. 2003. 《西方译论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刘润清. 1995.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马新国等. 1994. 《西方文论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申丹. 2000. “从三本著作看西方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 《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 申雨平. 2002.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谭载喜. 2004.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焕生. 1998. 《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伍蠡甫、翁义钦. 1985. 《欧洲文论简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谢天振. 1999.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谢天振. 2003.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许宝强、袁伟. 2001.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许钧、袁筱一. 2001.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杨建华. 2004.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杨自俭、刘学云(编). 1994. 《翻译新论》[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张柏然、许钧(主编). 2002.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南峰、陈德鸿. 2000.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张中载. 2002.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ed.) 2004.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assnett, Susan. 2004. *Translation Studies*[M]. 3rd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ates, E. Stuart. 1936. *Modern Translation*[M]. London, OUP.
Beaugrande, Robert-Alain de. 2000. *On the Concept of Sensitive Translation*[M]. Robert-Alain de Beaugrande's Home Page.
Bell, Roger T. 200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mpbell, G. (ed. and trl.) 1789. *The Four Gospel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With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s, and Notes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M]. London: A. Strahan & T. Cadell.
Catford, John. C. 1969.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sterman, Andrew and Wagner, Emma. 2002.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M]. Manchester,UK & Northampton, MA.: St.Jerome Publishing.
Chukovskii, Kornei. (trl. & ed. Lauren G. Leighton) 1984. *The Art of Translation*[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Darbelnet, J. L. 1970. *Traduction littérale ou traduction libre*[J]. in *Meta* 15/2
David Katan. 2004.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Davis, Kathleen. 2004.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Derrida, Jacques. 1972/1981. *La disséminatio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trl. Barbara Johnson as *Dissemin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9. 'Living On'/Borderlines, trl. James Hulbert in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Continuum,75-176.
----- 1988. *Ulysses Gramophone*, in James Joyce: *the Augmented Ninth*, Syracuse UP.
Dreyfus, H.L.and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Chicago UP.
Even-Zohar, Itamar. 1978.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C]. Benjamin Hrushovski and Itamar Even-Zohar (eds) *Papers on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 1997. "The Making of Culture Repertoire and the Role of Transfer"[J]. *Target* 9:2. 373-381.
----- Even-Zohar, Itamar and Gideon Toury. eds. 1981. *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J].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Aviv University. [= *Poetics Today* 2:4.]
Firth J.R.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C]. 1934-1951. London: OUP.
Flotow, Luise v. 2004.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04.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Revised 2nd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Gutt, Ernst-August. 2004.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alliday, M A K.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64.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J]. *English Studies Today* sIII. Edinburgh.
- 1964.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C].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Ed. H. G. Lunt. The Hague: Mouton.
- 1967.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C]. *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Ed. S. Chatman and S. R. Levin.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1970.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C]. *New Horizons on Linguistics*. Ed. J. Ly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4. "The Place of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in the System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C]. *Papers o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Ed. F. Daneß. The Hague: Mouton, 43-53.
- 1976.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M]. London: Oxford UP.
- 1984.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M]. (Language Education). Oxford: Oxford UP
- 1984. Halliday, M A K R P. Fawcett, S. M. Lamb and A. Makkai.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C]. vol. 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Pinter.
- 2002.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C].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atim, Basil. 2001.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atim, B. & Mason, I.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2001.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eidegger, Martin. 1996. *Being and Time*[M]. trl.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ermans, Theo.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 2000.3.31. 'Shall I Apologize Translation?'[R] at the Cho Yiu Conference Hal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04.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ickey, Leo. (ed.) 2001.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olmes, James S. (ed) 1970.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M]. The Hague: Mouton.
- 1988.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Amsterdam: Rodopi.
- HUANG Guowen, WANG Zongyan. (ed) 2002.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Kelly, L. G. 1979.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M]. Oxford: St. Martin's Press.

- Levý, Jiří. 1965. *Will Translation Theory Be of Use to Translators?*[J]. R. Italiaander.
- 1967.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C]. *To Honour Roman Jakobson III*, The Hague: Mouton.
- Newman, F.W. 1856. (ed. and trl.) *The Iliad of Homer*[M].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 Newmark, Peter.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Nida, Eugene A.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Nida, Eugene A. & Taber, Charles R. 200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Nord, Christianne.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 Trl. Christiane Nord and Penelope Sparrow. Amsterdam: Rodopi.
- Nord, Christiane. 2001.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Pym, Anthony. 1995. *European Translation Studies, une science qui dérange, and Why Equivalence Needn't Be a Dirty Word*[J]. *TTR* 8/1.
- 2000. *Negotiating the Frontier. Translators and Intercultures in Hispanic History*[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Quine. W. V. O. 1961.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M].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P.
- 1969. *Word and Objec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eiss, Katharina and Vermeer, Hans J. 1984.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Übersetzungstheorie*[M]. Tübingen: Niemeyer.
- Robinson, Douglas. 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Manchester: St. Jerome.
- 1997.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chulte, Rainer. et al. 1992.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 Chicago: Chicago UP.
-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nell-Hornby, Mary. 2001.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teiner, George.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Toury, Gideon.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C].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999. "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C]. Christina Schä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etc.: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10- 32.
- 1999a. "Culture Planning and Translation"[C]. Alberto Álvarez Luján and Anxo Fernández Ocampo, eds. *anovar/anosar: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a interpretación I*. Vigo: Servicio de Publicacións da Universidade de Vigo, 1999. 13-25.
- in press.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Planning and the Planning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 Exemplary Case"[C]. Saliha Paker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nslation: (Re)shaping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ogaziçi University, Istanbul.
- 2001.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Tymoczko, Maria. 2004.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00.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echsler, Robert . 1998. *Performing Without a Stage: The Ar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M]. [S. l.]Catbird Press.

Wilss, Wolfram. 1982.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M]. trl. Wolfram Wilss. Tübingen: Gunter Narr.

----- 2001.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